文史杂谈

《广陵散》不绝

谢丽成

魏癸未四年，即公元263年的一个秋风萧杀的中午，洛阳城外的刑场边，围的是人山人海，人们都在悲痛地观看“中散大夫”嵇康的受刑。尽管有三千太学生为之请愿，仍动摇不了司马昭杀嵇康的决心，嵇康之死，板上钉钉。嵇康看了看日影，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就让兄长嵇喜拿来琴，弹奏了一曲清越激昂的《广陵散》，然后叹息着说：“从前袁准要跟我学习《广陵散》，每每我都吝啬不传给他。现在，《广陵散》恐怕要失传了吧！”然后，从容赴死，血染刑场。

即便是一千七百多年的今天，这段历史读来仍让人为之动容，于是，人们也记住一个常识——嵇康之后，《广陵散》从此便失传了，并且，对司马昭、钟会等这些当权者尤为痛恨，他们不仅轻易就葬送掉艺术家的生命，也摧毁了天下名曲《广陵散》，后世再也听不到这超凡脱俗的曲子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虽然嵇康感叹“《广陵散》从此绝矣”，但是《广陵散》并未失传。在当时，嵇康演奏《广陵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但也有其他人会演奏《广陵散》，只不过没有嵇康演奏得好而已。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人弹奏，并留有许多有关《广陵散》的故事传说，至今传世的《神秘琴谱》《琴书大全》和《太古遗音》等琴书中都有记载。只是，《广陵散》因为嵇康的身死而名扬天下，却遭到更多正统人士的嫉恨，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作品。所以，曲子只好经常改头换面，以至于有《广陵止息》《华胥引》和《太平引》等许多别名。

史书上有关《广陵散》的记载不绝如缕。《琴史》曾记载陈拙历经波折求学《广陵散》的故事。陈拙是晚唐的著名琴家，当年，为了学习《广陵散》，曾向前辈琴家孙希裕请教，谁知，孙希裕勃然大怒，说：“这种有伤国体、有违风化的曲子你也学？”陈拙只好转而向隐居泰山的道士梅复元求教，终于学得这首“凌凌有兵戈气”的曲子。据《紫阳琴书》记载，《广陵散》在两宋时期极为流行，差不多所有的琴家都会弹奏这首曲子，以至于引起大学者、理学家朱熹的极大不满，指责《广陵散》“其声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在崇尚三纲五常，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朱熹看来，“臣凌君”自然是大逆不道，当受千刀万剐。明代的大学士、《元史》的编撰者宋濂曾为一本叫《太古遗音》的琴书写跋，在跋中借题发挥，说《广陵散》有“愤怒躁急”之情绪，并责骂道：“不可为训，宁可为法乎？”直言《广陵散》不当流传于世。

看来，即便后世有无数当政者和卫道士都想摧毁《广陵散》，但《广陵散》却以别样的方式流传了下来。它是我国现存古代琴曲中唯一具有征战杀伐、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乐曲，它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一脉相承，不仅是古琴曲的精品之作，更是文化传承的江水汇流。所以，《广陵散》是不会断绝的，定当流传千古。

散文

一盘生菜是梅花

任崇喜

岁寒之时，疏影横斜、清雅宜人的梅花浓而不艳、冷而不淡，令人神骨俱清。闲读，却发现梅花也是可以做花馔的。

“春食花，夏食菌，秋食果，冬食菜。”食花的习俗，古已有之。鲜花，餐风饮露，汲取日月精华，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珍馐佳肴。食花，不只是情趣高雅，文人雅士也看作是一种生活享受。须知，所谓秀色可餐，不光是眼中的佳丽，还有口中的福分。花馔，是用四时花卉做成的菜肴或点心，在中国历史悠久。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的花馔15种，明人戴羲的《养余月令》记载的花馔16种，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的花馔14种。正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季节不同，花馔的原料自然有异。木樨花、紫藤花、玉兰花、玫瑰、桃花、菊花、桂花、牡丹、映山红、南瓜花、丝瓜花、黄瓜花、洋槐花等，都曾成为花馔的主角。“好梅而人清，嗜茶而诗苦。”梅花花馔自然显得特别。

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对梅花极为推崇，言其味甘、微苦，但能生津开味。

在《山家清供》中，有梅花汤饼、蜜渍梅花、梅粥、不寒斋（梅花）、素醒酒水（梅花）等多个条目。《清稗类钞》也有梅粥的条目。汤饼，其实就是面片汤，将面片下锅煮熟。梅花的作用，大概就相当于调味的青菜。一般认为，梅花粥为最好。大米下锅熬稠后，放入梅花便停火，然后加入少量的白糖，便可食用。据说梅花粥香甜可口，吃了可以温中健脾、开胃除寒。“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米水融合，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这是袁枚在《随园食单》里为粥专门拟定的标准。冬日里，一碗温暖的粥“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一碗米粥在手，即便如郑板桥所言的“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形象又如何呢？毕竟，“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

倘若说梅花汤饼与梅粥是主食，蜜渍梅花与不寒斋该是佐餐的生菜了。斋本是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后多指咸菜。想来古人多雅致，冬日雪后，取来各色梅花，用清水濯净，用雪水先煎煮，去其涩味，然后用白糖调制，再用彩色瓷盘装好，赏心悦目，更不用说入口生津了。

冬日品梅花宴，是古代文人一件最风雅不过的乐事。在沈复的《浮生六记》中，专门记了芸娘所置的梅花盒：“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连器具也这么讲究，菜的色、香、味不必描述了，尽可往美处想。难怪，清代才女金翠芬有这样的诗：“扫将残雪试煎茶，暖阁沉沉翠幕遮。小饮劝郎诗兴好，一盘生菜是梅花。”

好个“一盘生菜是梅花”！极富有生活情趣。琴瑟相和，举案齐眉，是生活的和谐气象。

上面的诗，是金翠芬写给丈夫的《无题》诗5首中的一首。这个金翠芬是何许人也，我了解不多，倒是从徐珂的《清稗类钞》看到了她有些模糊的身影。文字不长，不妨抄录一下：“南海朱星工六法，绘仕女尤精绝，人争宝之。里女金翠芬亦善此，能吟咏，睹朱画，辄叹曰：‘得此即嫁之，足矣。’家藏朱画至伙，辄就其端，题以绝句，日夕自诵之。父以其及笄，将受王氏聘。翠芬闻之，绝粒食者二日，旋以一诗呈父。父令其母探意，翠芬不语，母遂辞王聘。时朱亦未婚，翠芬乃赋百韵诗寄之。朱赋诗以答，丐人为媒，遂谐伉俪。及成婚，时有倡（唱）和，里人美之。”这个故事有个很美妙的名字：画姻缘。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字。茫茫人海，能与心仪者百年修得同船渡，也是值得的。

这是不是因了梅带来的福气呢？据说梅开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梅花花瓣简单，但寓意丰富，为人处事做事，身心融为一体，才能臻至化境，尽现生命里的安稳与尘世的大美。

藏南夕照　王国强　摄影

随笔

那片树 那群鸽子

张健莹

上海淮海中路的西端，一片香樟树的掩映中，有一座欧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幢白墙红瓦的楼房。草坪上几只鸽子漫步，天空中几声鸽哨悠扬。这儿是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曾经生活过15年的地方，如今的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故居是主人曾经生活的留痕，说不上奢华却处处精致，门厅、过道厅连接客厅，挂着主人精心挑选的俄罗斯油画《落日》、徐悲鸿的《双马垂柳图》、印尼的风俗水彩画。

客厅如今是展厅，馆藏珍品上万件。有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之印，中华革命党本部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之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致宋庆龄的签名感谢信；斯大林国际奖金荣誉奖状，印尼总统苏加诺赠送的短剑；苏联政府赠送的革命胜利40周年磁盘。也有小小的《三毛乐园会》纪念章，有父母赠送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的陪嫁。珍品文物述说着宋庆龄人生传奇，述说着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的丰功伟绩，述说着她为妇女为儿童为世界和平的故事。

馆藏的珍品我最看重的是宋庆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手稿，名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足足51页，有钢笔书写，有圆珠笔书写，有铅笔书写。宋庆龄用时一年，几易其稿。那是1966年，“文革”诋毁孙中山先生的浊流泛滥，甚至诬蔑孙先生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是牛鬼蛇神。宋庆龄的文章表达了她对孙中山先生尊重挚爱，对先生革命事业的一往情深。以往每逢先生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把双层窗帘拉得紧紧的，面对先生遗像，默默哀思。唯独这次，当有人要摘下天安门广场孙中山画像，要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孙中山铜像的时候，她无法平静了。她以七十四岁的高龄，慷慨激昂的发言，捍卫孙中山先生的尊严，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勇敢也是担当。

展厅中一件香云纱旗袍、一件自制的八卦衣，让我驻足良久，旗袍是手工缝制的，穿着已久了，可能是因为年老发福在两侧又加了同样的料子改制，宋庆龄很久地穿着它。她从五十年代末很少添置衣物。旧衣服能穿就穿，不合适了改合适了再穿。她和保姆李燕娥一起用二十六块碎布做成一件棉背心，常常在清晨工作时用它御寒，她喜欢这件八卦衣。宋庆龄用自己的工资订阅报纸，拿自己的工资接济周围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一次身边人从家乡带回一些橘子，她拿出十元钱送去。甚至在警卫战士结婚时她不忘送去礼物。

她楼上卧室旁边，是她的保姆李燕娥的住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相册，名为友谊。相册里有许多宋庆龄和李燕娥的合影，是宋庆龄从以往的照片中精挑细选的永久纪念。李燕娥十六岁起，跟随宋庆龄左右，走遍了大地山山水水，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从来不分主仆，情同姐妹。李燕娥的床头至今还放着宋庆龄给她的熊猫收音机。晚年，李燕娥生病，宋庆龄用自己的工资专门请保姆照顾，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嘱咐要把她葬在父母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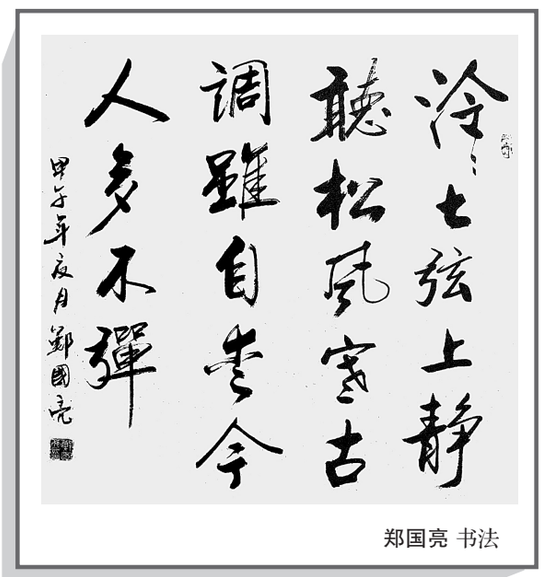
在宋庆龄陵园处，在宋氏父母身边，有两座墓同样大小，宋庆龄墓在右，李燕娥墓在左。

宋庆龄就是这样，她不因身居高位，颐指气使；她从来平等待人，博大宽厚；她时时保持风度优雅，她的精神层面处处显示高贵。

走出纪念馆，可以看到草坪，可以看到雕像，可以看到满园的樟树，可以看到满园走着飞着的鸽子。虽然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院子还是静谧。

樟树不算高大，枝叶却伸得很远，树荫很大。宋庆龄常常着布衣布鞋在园中散步，她喜欢这些树。曾经总理怕院子太小请她搬家，她说舍不了香樟树，是因为这香樟树叶儿葳蕤冬夏常青？还是喜欢这树干散发香气，与生俱来，就算树枯了，叶落了，香气依旧？在她散步的当儿，她常常停下来喂喂她的鸽子，这爱好伴随终生。这不单单是鸽子象征和平的寓意。

离开故居时，我买了一个造型别致的金属书签留作纪念，书签一头是香樟树叶，另一头是展翅飞翔的鸽子。



郑国亮 书法

郑州地理

台肖村

娄继周

在郑东新区，位于郑开大道与万三公路交叉口向北8公里万三路西侧一公里处，北距黄河5公里，有一个普通的村子台肖村。该村有3个村民组，286户，1180余口人。原属中牟县万滩镇管辖，2013年6月因区域划分现隶属于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民风淳朴，以农为生。村民以肖朱姓氏为多。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村，古代却大有名气。相传这里是尧帝巡行访贤发现舜的地方，后人在此建了尧舜祠，以作纪念。古籍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中已有“中牟有尧祠庙”的记载，明清中牟县志都有尧舜祠的记载。即指此地。可知此地早在南北朝时即建有祠庙，为一方圣迹。至今在该村东街，仍有近代重修的坐北朝南尧帝庙正殿三间，供奉着尧舜二帝圣像。殿前东西两侧分别有陪庙关帝庙和大尉庙各三间。关帝庙祭祀的是三国名将关羽，大尉庙则不知祭祀者谁。庙院立有明清及民国时期碑刻5通，记载了该庙及村庄的传说来历及沿革，颇有历史文物价值。碑文显示，庙宇历经明万历三十五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嘉庆七年、光绪二十年以及民国三十一年几次重修，概因黄河泛滥，屡修屡废。据清代碑刻记载，该村原为高台之地，因有纪念舜帝的庙宇，名为舜子台。明代时期形成村落，称台上村。清初肖姓迁居于此，演名台肖村。因有圣庙，附近村民一年四季按时祭祀，每年的清明节传统庙会，久盛不衰。传说古时庙前的南北大路，是开封至西安的驿道，帝王西行长安路经此地，也要下轿停留，祭拜尧帝，以示崇敬。

走进村里，随便问问哪位老人，都能向你讲述那个流传千年的美丽故事：中华民族的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先民“五帝”之一，尧帝名放勋，舜帝名姚重华。尧帝因先封陶，又封唐，史称陶唐，又称唐帝。传说尧帝晚年不欲把帝位传给不肖儿子，便到处巡行，查访贤人。有人向他推荐舜帝，因为舜以孝著称，又有贤才。古代“二十四孝”之首就是舜。尧为了考察舜的德行，便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玉英嫁给了舜。经过多年认真仔细的考察，认为舜足以担负王位，便把王位禅让给了舜。这就是古代著名的“禅让制”。传说村子附近就是唐尧巡行发现舜的地方，传说当时舜在此隐居躬耕，因此古称舜子台。后人为纪念尧帝在此建造庙宇，春秋致祭，史称尧祠，又称唐帝庙。沿革至今，圣迹犹存。

挚故

官样文章

阎泽川

在今天，凡是徒具形式的例行公文和措施，人们均斥之为“官样文章”。

其实，在古代“官样文章”却系美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文章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槁；台阁之文，其气温润。”北宋诗人王安国又云：“文章须要官样。”可见“官样文章”原是对温润、雍容、堂皇、典雅的庙堂佳作的赞美。

到了清代，八股文盛行，官场上的文告律令等等，更多敷衍而不实际的虚文。这个成语转指这类遵循套式的空洞无物的文字，已带有轻视不屑之意了。

新书架

《唐崖》

杨鑫垚

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8个世界文化遗产。许多人对土司的了解，也许仅限于阿来名作《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家的傻儿子。新锐作家楚西鹄先生这一部《唐崖》，以时间为轴、空间为辐，全景式地勾勒出一幅明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让我们既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特殊制度的兴荣衰落，又充分领略了明朝统治者治边政策的变化。土司的世界里，有爱情，有阴谋，有市井细民的平淡生活，也有贵族豪门的钩心斗角。但这一切，都属于人性的真实。

连载

“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当刘禹锡走进贞元九年正月的礼部贡院时，他的心中充满着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权德舆不遗余力的上下奔走，来源于士林群贤的舆论公议，更来源于刘禹锡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当此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刘禹锡一试而中，考取进士，正可谓承顺人情，咸与相庆。此次共取进士三十二人，同期登第的还有柳宗元等人。柳宗元小刘禹锡一岁，后来二人终身为友，诗文互答，被誉作“刘柳”。

以唐代科举制度而言，进士及第也只是获得了出仕为官的许可，若要实授官职，仍需继续参加考试，或往地方大员幕府中任职。以禹锡之声望，选择继续参加贞元九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正是明智之举。又试中第，令刘禹锡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朝中重臣竞相打听，邀约之函如雪片飞来。

在众多关注新晋进士的目光中，便有太子侍读王叔文。

王叔文为太子侍读。其人博学广闻，长于谋划决断，素怀治国平天下之大愿，时常在太子李诵面前诉说民间疾苦，深得太子信任。由于德宗皇帝多疑，王叔文时常劝导太子时时示弱，事事示忠，以保东宫之位。而王叔文则交通内外，于不动声色之间考察贤良，笼络志士，一旦皇位更迭，便可大展宏图。

由柳宗元引荐，禹锡结识王叔文。权德舆曾言“禹锡有宰相器”，使王叔文认定刘禹锡乃可用之大才。

禹锡对当时天下皇威不振，州道节度使往往不奉朝令，相互攻伐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种种惨状，常生感叹；时常困惑于朝廷屡发大军征讨，却往往无功而返，贼寇愈伐愈强，愈伐愈众，甚至伐寇之臣养寇自重，伐寇之师自成割据，更是痛心疾首！与王叔文、柳宗元几番深谈，禹锡以为，若想有朝一日立下再造乾坤之功，有两件事必要加以详察。其一为盐铁之利，其二为治军之权。所持重者乃利权与军权，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无论何时何地，此二者为解决一切军国事务的根本所在。朝廷之所以能在战之不胜的情况下岿然不倒，原因便是朝廷手中掌握的盐铁税赋比叛贼们多。安史逆贼以数镇之钱粮，欲养攻略天下之雄兵，可谓自不量力。甚至可以说，朝廷不是打败了叛贼，而是熬死了叛贼。至于如何治军，禹锡认为，只有将盐铁之利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朝廷才有能力在中外众臣中纵横捭阖，邀买人心，为我所用。

王叔文深以为然，只是顾虑无论收利权还是收军权，都无法绕过宦官这道坎。要制约宦官，必待新君即位，不能操之过急。鉴于此，刘禹锡写下《儆舟》，揭示逆境中须忍辱示弱、顺境中应常持警惕之理。

第三章　丁父忧韬光养晦

怀着“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之心，刘禹锡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往来更加密切，相互之间迎来送往，评书论文，常常通宵达旦，意兴方阑。贞元十一年（795年）吏部拔萃科开考，刘禹锡不负众望，在吏部拔萃科中技压群雄，射得高策，第三次在含元殿上接受皇帝的召见。

依照唐时习俗，集进士、博学鸿词和吏部拔萃三科于一身者，加官进爵尤其容易。而此时，权德舆已任起居舍人，兼知制诰，权位益重，因而刘禹锡中吏部拔萃科后，如其父刘绪所期望的一样，禹锡得授太子校书一职，入东宫为官。太子校书是东宫属官，负责校勘崇文馆书籍。此职看似清闲散漫，其实不然。古时典籍保存不易，需人工校勘、刻印、保存，往往易遭篡改。太子校书在所献书籍中若加入个人观点，则可直接影响到太子的思想，进而有可能影响到国家未来的方向。进入崇文馆履职之后，禹锡每日泡在书海里，从无数先人的智慧结晶中一步一步地学习盐铁转运之法、学习行军布阵之术。

刘禹锡得入东宫为太子校书，其中亦有王叔文的一番努力。因柳宗元的不断推赞，王叔文对刘禹锡的了解日益加深，他越来越确信，刘禹锡是他宏伟的政治蓝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他更加深信，他也是刘禹锡实现人生理想所梦寐以求的登天之梯。

刘禹锡与王叔文同为东宫属官，而王叔文官秩较高。王叔文以自己批注的《后汉书·灵帝纪》言及以汉言唐之习俗，禹锡惊觉唐朝运数果真与汉朝有相似之处：东汉自桓灵二帝起，外戚、宦官相继干政，天下沸腾，两次党锢之祸压制了士林清流，黄巾之乱严重动摇了国本，平叛战争却造成了更危险的军阀割据之局面，最终导致了汉王朝的灭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汉喻唐，不知是否也同时预言了大唐的未来？

王叔文韬光养晦十余载，坚持不辍地向太子讲述民间疾苦，研习治国方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扭转乾坤。他遍察百官，细考众僚，得到一批精明强干之臣聚拢太子麾下，图议大计。他感佩刘禹锡治国之良策，以为禹锡是唐朝百年难得之奇才，故而愿以五尺身、百分力，助禹锡一展襟抱！并为刘禹锡的人生进行规划：少年得志，不必急于立业，可在崇文馆中精读金玉之言，吸纳古今智慧。他提醒刘禹锡：现在正是结交群贤、甄遴俊友的大好时机，万勿贪功求进，而成失足之恨！

刘禹锡担任太子校书的第二年，即贞元十二年（796年），其父刘绪病逝于扬州。噩耗传来，禹锡痛不欲生，立即卸任辞官，千里回转，在扬州为父亲治丧。后按照父亲遗愿，护送刘绪灵柩回荥阳檀山原祖茔安葬。待丧事料理完毕后，禹锡便于洛阳刘氏旧馆中住下，以群书陪伴，开始了三年丁忧生活。

虽是丁忧，毕竟洛阳为大唐东都，各级官吏均为当朝重臣，文人墨客往来频繁，天下各道消息无所不达，丝毫不逊于长安。禹锡在京结交的诸多好友，常往洛阳走动，自然带来不少时新消息。更因东都实无皇帝坐镇，舆论气氛相较长安更为放松。因此，禹锡虽在家中闲坐，心思却未有片刻远离庙堂。

贞元十四年（798年），宦官的权势更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步。此年闰五月，长武城神策军作乱，虽侥幸得平，但德宗皇帝在平乱之后竟然命宦官口宣谕旨，不下敕书，令朝野一片哗然。从此，宦官随口一言便可假称圣谕，更加为所欲为。从各地往来的消息中，刘禹锡感到天下情势似乎真的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弹指之间，三年丁忧将满，刘禹锡不得不为自己的仕途而担忧和思考。京城要职均无空缺，地方小吏又无光明前程。苦闷之中，杜佑的一封来信，点燃了刘禹锡的希望。

2